

中国西部城镇化的空间格局优化研究

●胡 浩¹ 魏后凯² 晏世琦¹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北京 100028;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732)

内容提要: 本文从西部地区城镇化的总体状况和空间格局现状出发,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十一五”以来西部地区城镇化的进展及其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西部地区城镇化空间格局优化的具体思路:以城市群的增长极培育为突破,以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为目标,以发展轴线、延伸轴线、沿边发展环线等形成的网状空间结构为骨架,以国家级、区域级两级增长极为节点,以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边境地区、工业转型区、资源富集区6种类型区为填充,融合点线面要素形态、极核轴带类型区,共同组成复合型、网络型空间结构体系支撑的城镇化空间格局。

关键词: 西部大开发; 新型城镇化; 空间格局; 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61(2015)05-0001-06

DOI: 10.13483/j.cnki.kfj.2015.05.001

伴随着“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逐步确立,中国进入城镇化发展新时期的趋势进一步明晰。进入新的城镇化发展阶段后,我国城镇化推进的重心正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城镇化建设所带来的空间格局也将发生相应变化。优化城镇化的空间格局,协调东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重视西部地区城镇化跟进,探索适合西部地区特点的城镇化发展新路径,是实现城镇化发展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从非均衡转向相对均衡的必然要求。

一、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及空间格局现状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特别是“十二五”期间,我国西部地区城镇化在数量提升、速度加快、规模增加、等级提高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为处于城镇化加速时期的西部地区承接中国人口城镇化的主战场奠定了基础。城镇化发展在地域发展差异上所呈现出的水平北高南低、速度南快北慢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区域格局。

(一) 西部地区城镇化的总体状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东部地区所主导,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12个省(区、市)的城镇化率和城镇建设水平逐步提高。“十二五”期间,我国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提速快于东部地区水平;西部地区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显著增加,城镇人口比重趋于上升;西部地区城市建设水平和质量均有

大幅度提高,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等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西部地区城镇规模等级和空间格局框架已初步展开,城市规模等级明显提高,城市群初具形态,城镇体系初步形成。

从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发展阶段来看:截至2013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数为13.61亿,其中城镇常住人口7.31亿,农村常住人口6.30亿,中国城镇化率达53.73%^[1],由长期低于世界和发展中国家水平,一跃上升到超过世界1个百分点、超过发展中国家5个百分点的水平,同时也越过了50%的城镇化发展拐点^①,进入由加速向减速转型推进的时期。但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客观差异,城镇化率这一指数在不同的区域也有不同的发展现状和阶段特征。当前,东部地区城镇化率已超过60%,已经进入城镇化减速推进时期,但西部地区城镇化率尚未越过50%的拐点,而且相比全国和东部平均水平均有不小的差距(2013年分别低7.75个百分点和16.82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十二五”前3年(2011—2013年)的城镇化率年均提高在1.08个百分点左右,远低于“十五”、“十一五”期间1.43个、1.59个百分点的年均增幅,而且预计东部地区城镇化的这种减速趋势将会持续下去。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化率“十二五”前3年的年均增速在1.81个和1.66个百分点左右,远高于“十五”和“十一五”时期的增速水平,更高于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率增速水平。预计今后一段时期内,中西部城镇化进程仍将会保持较高的速度,甚至短

期内会呈现加速态势。综合分析不难发现,我国西部地区 45.98% 的城镇化水平虽然较全国平均水平(53.73%)和东部水平(62.80%)均低,但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提高幅度已超过了东部地区,处于城镇化加速时期的西部地区未来将成为中国人口城镇化的主战场之一^[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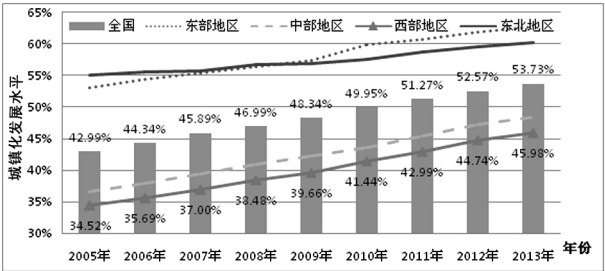


图1 2005—2013年全国城镇化率和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率对比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14》整理所得

(二)西部地区城镇化的省际差异

从西部地区省际之间的城镇化发展水平上看,目前西部12省市区城镇化水平在南北方向和东西方向上均存在明显的差异,北高南低的省际差异格局较为明显。在南北方向上,2013年西北地区城镇化水平为49.12%,比西南地区高4.74个百分点;西部地区12个省(区、市)行政单元中,内蒙古自治区的城镇化率最高,达58.71%;西藏自治区的城镇化率最低,仅23.71%,两者相差35个百分点。内蒙古、宁夏、新疆、青海等北部省区的城镇化水平均较云南、贵州、西藏等南部省区较高。城镇化超过45%的内蒙古、陕西、宁夏、青海、重庆5个省区中,除重庆处于西部地区的中部位置外,其余4个省区均在北部。城镇化超过40%的9个省市区中,也只有一个广西属于南部。这一特征与西南地区地形地貌结构较为复杂、农村生产生活分散、城市规模普遍较小、经济发展对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聚集度不高等,具有一定的必然联系。在东西方向上,西部偏东的省区较偏西的省区发展水平高,北部省区较南部省区发展水平高。城镇化超过50%的内蒙古、陕西、宁夏、重庆4个省市区均为西部大开发的12个省(区、市)中比较靠东的省区,而新疆、西藏等较为靠西的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均较低于内蒙古、陕西、重庆、广西等省区。

这与西部地区各省(区、市)现有的地形地貌、土地覆被特征和人口、城市偏东集中的自然、人文因素密切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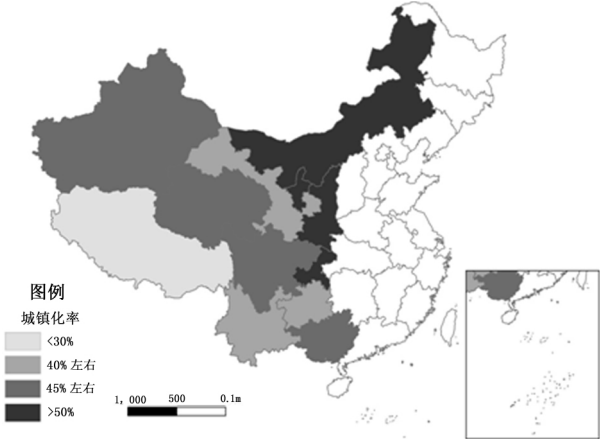


图2 西部地区城镇化格局现状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整理所得

而在城镇化的发展速度上,西部地区不同省区、不同时期城镇化发展的水平差异较大,省际之间总体呈现南快北慢的发展态势。西部大开发实施以来,西北地区的城镇化速度总体略慢于西南地区(表1)。“十二五”前3年各省(区、市)之间的城镇化发展速度差异上也延续这一特征。西藏是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最低的地区,2005年以来,无论是“十一五”还是“十二五”时期,城镇化水平年均提高幅度都仅在0.33个百分点左右徘徊。“十二五”前3年城镇化速度最慢的省区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期间城镇化水平仅提升0.9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0.31个百分点,还不及西藏自治区年均0.33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十一五”期间,内蒙古的城镇化水平提高了6.8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37个百分点,远高于全国城镇化水平年均提高1.12个百分点的幅度,是“十一五”时期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年平均增长最快的省区。但“十二五”期间,这一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仅仅从2011年的56.62%增长到2013年的58.71%,3年期间仅有2个百分点的水平提升,年平均提高幅度从“十一五”期间的1.37个百分点降为“十二五”期间的0.7个百分点,城镇化速度大为减缓。

表1 2005—2013年西部各省区城镇人口比重

%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内蒙古	47.20	48.64	50.15	51.71	53.40	55.50	56.62	57.74	58.71
广西	33.62	34.64	36.24	38.16	39.20	40.00	41.80	43.53	44.81
重庆	45.20	46.70	48.30	49.99	51.59	53.02	55.02	56.98	58.34
四川	33.00	34.30	35.60	37.40	38.70	40.18	41.83	43.53	44.90
贵州	26.87	27.46	28.24	29.11	29.89	33.81	34.96	36.41	37.83
云南	29.50	30.50	31.60	33.00	34.00	34.70	36.80	39.31	40.48
西藏	20.85	21.13	21.50	21.90	22.30	22.67	22.71	22.75	23.71
陕西	37.23	39.12	40.62	42.10	43.50	45.76	47.30	50.02	51.31
甘肃	30.02	31.09	32.25	33.56	34.89	36.12	37.15	38.75	40.13
青海	39.25	39.26	40.07	40.86	41.90	44.72	46.22	47.44	48.51
宁夏	42.28	43.00	44.02	44.98	46.10	47.90	49.82	50.67	52.01
新疆	37.15	37.94	39.15	39.64	39.85	43.01	43.54	43.98	44.47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14》及2006年—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二、西部地区城镇化及其空间格局存在的问题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 尽管西部地区在城镇化建设方面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 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还面临着城镇化发展质量不高、城镇体系建设不完善等客观问题, 同时, 城镇化推进的这种数量质量不匹配、规模结构不协调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西部地区区域发展过程中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

(一) 西部地区城镇化质量不高

近年来, 尽管西部地区城镇化速度较快, 但城镇化水平和质量不高, 与全国其他地区存在较大差距, 而且也不适应西部大开发的要求。首先, 西部地区城镇规划与管理理念落后, 城镇建设质量不高, 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的需要; 其次, 西部地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滞后于城镇发展速度, 不能满足未来快速城镇化和人口集聚的需求^[3-5]。许多城镇不同程度的存在道路失修或未修、交通拥挤、供水供电紧张、燃气不足、住房水平低下、文化体育设施和环境质量差、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缺乏等状况^[6]。再次, 区域之间城镇发展的明显差异又进一步加剧了西部地区城镇化地区差异分化的趋势^[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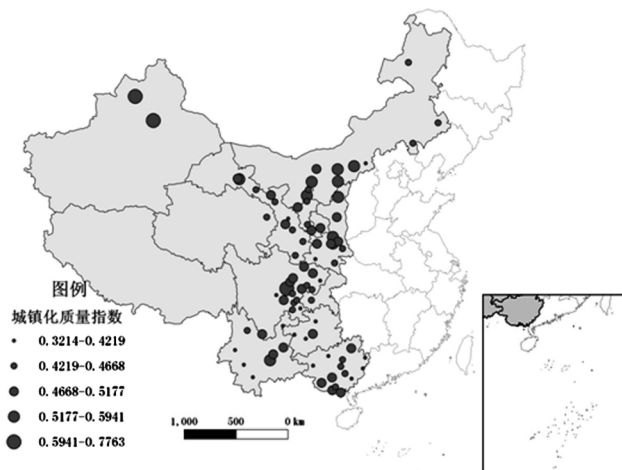


图3 西部地区和全国的城镇化质量指数

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报告》整理所得

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镇化质量评估与提升路径研究》创新项目组2013年《中国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报告》的数据分析, 西部地区共有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列入全国范围的综合评价(全国共286个城市, 这里没有对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数据进行评估统计), 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城镇化质量位居全国100名之后的有68个城市, 位居全国200名之后的有34个城市, 位居前50名的只有7个城市, 位居后50名的有22个城市。在城市发展质量方面, 西部地区有66个城市的城市发展质量指数低于0.6的水平, 只有14个城市能够入围城市发展质量排名前100的水平; 在城镇化效率方面, 西部地区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82个城市的城镇化效率指数低于50%的水平, 有76个城市的城镇化效率指数低于40%的水平, 60个城市

的城镇化效率指数低于30%的水平; 在城乡协调方面, 西部地区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只有28个城市能够进入全国前100名之列, 有32个城市的城乡协调指数都低于50%的水平。如果考虑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数据情况, 西部地区城镇化质量排名靠后的城市会更多, 城市发展质量指数、城镇化效率指数、城乡协调指数会出现更多的低值(图3)。

(二) 西部地区城镇体系尚不健全

目前西部地区城镇体系尚不健全。由于地域广阔、地形地貌、水文气候、交通信息等多方面原因, 城市分布相对较散, 集群效应难以发挥, 城镇等级结构不完善, 基础设施不健全, 城市行政指向过于明显。西部地区人口、产业、外资、人才等高度集中在少数中心城市, 出现西部地区城镇空间分布上“大的太大、小的太小, 缺乏中间环节”的结构问题。个别省(区、市)省会城市“一枝独大”的状态仍然存在, 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只有政治中心城市、交通枢纽城市、港口开放城市的城市规模略微较大, 其他中小城市、城镇均发展缓慢, 城镇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也都比较薄弱。12个省(区、市)范围内城市群数目和可以培育成城市群的数目仅有10个, 而且集群规模、发育程度明显劣于中部、东部地区, 城市群发展和区域发展缺乏大中型中心城市的带动和支撑作用。由于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相对落后, 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物流、客流、信息流、交通流等要素流动相对不足, 西部地区在城镇的分布上大多尚未形成空间上有机联系的城镇体系。

(三) 西部地区城乡发展差距问题突出

西部地区城乡发展两极分化较为严重, 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突出。由于建设条件限制和资金投入有限, 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建设状况远远落后于城市地区, 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资源配置、医疗卫生水平、科技文化投入、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城乡差异。西部多数地区农业生产基础薄弱, 甚至靠天吃饭, 农村居民收入微薄且收入水平极不稳定, 长期以来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远远低于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而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呈扩大趋势。据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 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十一五”从2005年的6404元增大到2010年的11389元, “十二五”从2011年的12913元增大到2013年的15877元。同时, 由于西部地区, 特别是边境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 大多交通不便、信息不畅, 造成西部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效应远不如其他地区, 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乡之间的统筹协调受到推进上的制约, 也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城乡分化的突出问题。

(四) 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区内差异仍然较大

相比其他地区, 西部地区的城镇化不仅存在水平较为落后、质量有待提高的问题, 还存在着区域内部差异明显且日益扩大的问题。西部地区各省区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城镇化差异在拉

大,省会城市与省内其他城市、边缘地区城市的城镇化水平也在拉大,进而造成一个省内只有几座城市、甚至只有两三个城市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的现象。在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上,西部地区城镇化率最高的内蒙古与城镇化率最低的西藏之间的差距2005年以来一直呈不断拉大的趋势,虽然2012年以后,这种差异拉大的速度明显降低,但地区间差异较大的现象依然存在(图4),西部地区较为发达的两个接壤省市——四川和重庆,“十一五”期间两省市的城镇化差距在13个百分点以下波动,而“十二五”以来两省市的城镇化差距却均在13个百分点以上,而且2012年超过了13.5个百分点;新疆与青海之间、新疆与西藏之间、青海和西藏之间等较为不发达的接壤省市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地区差异拉大趋势。新疆与西藏之间的城镇化率差异从2005年的16.3个百分点直线上升到2013年的21.2个百分点,青海与西藏之间的城镇化率差异从2006年的18.1个百分点直线上升到2013年的24.8个百分点,新疆与青海之间的城镇化率差异从“十一五”期间的年均1.44个百分点上升到“十二五”前3年的年均3.93个百分点;从变异系数的统计分析来看,“十二五”以来,西部地区各省(区、市)城镇化水平的差异整体上呈现出在21%上下波动的趋势;从标准差的计算来看,内蒙古与西藏之间的城镇化水平差异也呈逐步拉大的趋势,从2005年7.75个百分点变为2012年的9.57个百分点,7年之间差距拉大了1.83个百分点,而且标准差的拉大趋势显示与极差相似的特征,虽然在2012年之后地区间差距变化逐渐趋于缓和,但地区间差异的现象仍然较为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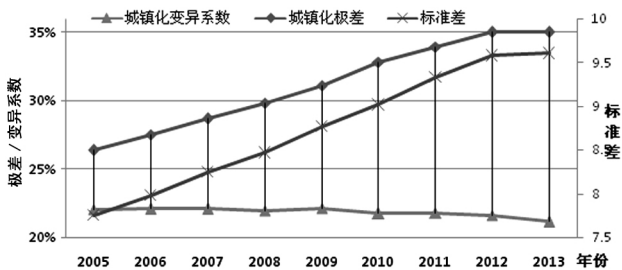


图4 2005—2013年西部地区省区间城镇化率极差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14》数据整理所得

三、西部地区城镇化空间格局优化的思路

西部地区城镇化的推进要在现有城镇化总体发展状况和阶段特征的基础上,根据西部地区内部各省(区、市)在城镇化发展水平、发展速度的区域差异、空间格局存在的突出问题选择适合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有重点地扩大城镇规模,发展大中城市,培育城市群,协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均衡发展,通过增长极的培育、经济区的提升、类型区的串联、发展带的构建形成科学合理的城镇化规模体系和节点贯通的网状空间结构,实现西部地区“十极两级六大区、五横二纵一环带”的复合型城镇空间格局优化布局。

(一) 培育两级增长极

新型城镇化战略在框架上以“人文城市建设”为中心,在空间上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包括“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最终形成环境、经济、社会 and 文化的协调关系和协同发展机制^[8]。西部地区新一轮的开发格局优化要借助城镇化的发展力量和城市群的建设动力,以城市群建设为途径,培育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国家级增长极和区域级增长极。城市建设基础和区位条件比较好的,以国家级增长极进行定位和建设;城市建设基础和区位条件不太好的,以区域级增长极进行定位和建设。通过两级十大城市群增长极的布局^[9],保证西部地区各省区均有相应的城市群建设内容。

表2 西北地区城市群增长极布局

编号	增长极名称	增长极级别	所在省区
1	成渝城市群	国家级	四川、重庆
2	关中—天水城市群	国家级	陕西、甘肃
3	兰州—西宁城市群	国家级	甘肃、青海
4	北部湾城市群	国家级	广西
5	呼包鄂榆城市群	区域级	内蒙古、陕西
6	黔中城市群	区域级	贵州
7	滇中城市群	区域级	云南
8	宁夏—沿黄城市群	区域级	宁夏
9	新疆天山北坡城市群	区域级	新疆
10	藏中南城市地区	区域级	西藏

(二) 提升重点经济区

尽管“十二五”期间重点经济区建设是西部大开发建设的重要引擎,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总体来看,重点经济区建设整体推进速度相对缓慢,对西部地区开发格局的影响不够理想;西部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71.4%,开发开放的大城市区(国家级新区)却只占40%,对区域开发建设的带动更显不足。截止目前,西部地区已初步形成成渝、关中—天水、北部湾、呼包银榆、兰西格、天山北坡、滇中、黔中、宁夏沿黄、藏中南、陕甘宁革命老区。11个重点经济区的发展建设中,只有成渝、关中—天水、北部湾、呼包银榆4个经济区建设推进较快;西部地区已有天府新区、两江新区、西咸新区、兰州新区、贵安新区、滇中新区6个国家级新区的发展规划得到国务院的正式批复,但西部地区6个国家级新区的区域带动更多局限于省会城市及其周围的狭小范围。鉴于目前的发展现状,西部地区今后应该在一系列对西部地区开发开放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规划陆续出台之际,进一步落实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区域建设,争取更多的国家级新区建设,调整优化重点经济区和国家级新区的规模和布局,提升重点经济区的作用和国家级新区的带动效应。

表3 西部地区重点经济区布局 and 导向

名称	所在省区	定位和导向	已批新区
成渝经济区	四川、重庆	作为西部大开发龙头地区,西南地区经济高地进行建设	天府新区、两江新区
关中-天水经济区	陕西	作为西部及北方内陆地区的开发开放龙头地区、综合型经济核心区进行建设	西咸新区
北部湾经济区	广西	作为西部地区沿海经济发展新一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进行建设	——
呼包鄂榆城市群	内蒙古、陕西	作为全国重要的能源、煤化工基地、农畜产品加工基地和稀土新材料产业基地、装备制造基地	——
天山北坡经济区	新疆	作为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支点和向西开放的重要通道进行建设	——
黔中经济区	贵州	贵州省的核心经济区,西部大开发我国西南地区重点培育的重要增长极	贵安新区
陕甘宁革命老区	陕西、甘肃、宁夏	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化工基地,西部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进行建设	——
宁夏沿黄经济区	宁夏	作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化工、区域性商贸物流中心进行建设	——
兰西格经济区	甘肃、青海	作为全国重要的新能源、盐化工、石化、有色金属和农畜产品加工基地、新材料和原材料产业基地进行建设	兰州新区
滇中经济区	云南	云南大中城市聚集、综合经济实力核心地区,西部大开发我国西南开发开放的前沿阵地	滇中新区
藏中南经济区	西藏	作为全国重要的农林畜产品生产加工、旅游文化基地,水电后备基地	——

资料来源:根据《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研究》和中央批复的公文公报文件归纳整理所得

(三) 串联六大类型区

西部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资源富集区、工业转型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的集中区域^[10]。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我国少数民族八省区全部位于西部^[11]。西部12个省(区、市)中有5个自治区、27个自治州、84个自治县,分布着40多个民族,少数民族地区占西部地区总面积的86.4%;西部地区是贫困人口的主要聚居地,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有375个位于西部地区,全国14个连片特困区有8个分布在西部地区;占全国国家级贫困县的拥有量36%的云南、贵州、陕西、甘肃4省份,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及六盘山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滇西边境山区等连片特困区无疑要成为我国全面小康和

扶贫攻坚建设的主战场;中国的西北地区是世界上有名的资源富集区,鄂尔多斯盆地、塔里木盆地、天山北部及东部地区、甘肃河西地区、柴达木盆地是全国重要的能源资源富集区,中国西南地区的川渝东北地区、攀西—六盘水地区、桂西地区等蕴藏的稀土、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不仅是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西部地区有众多老旧的工业基地和资源转型城市,全国262个资源型城市中有102个分布在西部地区,全国67个衰退型城市中有16个市区县分布在西部地区^②;西部地区有众多的革命老区和旧的老工业基地,这些地区在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做出过重要贡献,但由于近代以来发展机会的欠缺,成为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经济较为落后、发展较为缓慢的地区;西部地区有漫长的边境线,分布着众多边境口岸、沿边城镇,这些沿边地区多为交通较为不便,经济较为落后的贫困地区。西部地区虽然很多地方属于“老少边穷”地区,但也有些城镇很有发展潜力,借助资源富集的地区优势,借助工业发展转型的历史机遇,也能成为影响西部地区城镇发展格局和经济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西部地区的空间发展格局优化,要充分考虑到以上问题区域类型和每种类型区域对应的实际情况,通过交通网络和经济联系来串联相关类型区域,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不同类型地区城镇化的均衡发展。对应地,云南西部和南部、青海—甘肃接壤地区的少数民族地区中心城市,陕西北部地区、四川中部偏北地区、广西中西部地区的全国一类革命老区县市,青海四川交界地区、甘肃南部地区、云南西部地区、新疆西部地区的国家级贫困县,与周边国家边境线具有接壤关系的35个州盟地区和城市,四川—贵州接壤地区、陕西—甘肃接壤地区的老工业基地城市,新疆东部地区、内蒙古东北部地区的资源型城市等应作为西部地区城镇化空间格局优化的重点考虑对象。

(四) 构建沿边发展带

边境城镇和沿边地区的发展建设也应该是未来西部大开发关注的重点问题。沿边地区的发展是验证我国经济发展成效、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内容,也是维护我国地缘政治安全、深化中国与周边地区战略伙伴关系的内在需要。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我国外交关系的周边战略转向和我国周边地缘环境的好转,沿边地区及口岸经济的发展对西部边远地区增长刺激的地缘优势会逐步显现,西部边缘地区向前沿地区转变的后发优势也将得到体现。沿边开发开放背景下区域经济增长和边境城镇的发展将成为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推动的重要力量之一,西部沿边地区的建设发展和未来格局也将成为影响西部大开发空间格局的重要因素。

西部地区的沿边地区覆盖我国60%以上的陆地国境线,而且这些地区大多地形险要、交通不便。西部地区可以通过“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西部沿边发展带建设来带动西部沿边地区的均衡发展和西部城镇化的空间格局优化。通过新疆喀什、内

蒙古满洲里、广西东兴、云南瑞丽、黑龙江绥芬河、吉林延吉、辽宁丹东、内蒙古二连浩特、云南勐腊(磨憨)等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和沿边地区城镇“串起”整个条带状的西部沿边发展带。从东北向西南依次以珲春、满洲里、二连浩特、伊宁、喀什、日喀则、瑞丽、河口、龙州、凭祥、东兴等 11 个城市为重心,加快沿边地区交通、通信、口岸、供电供水、环境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利用外部资源和地缘优势加快边境口岸建设、开展与周边国家的边境贸易实现经济互补和发展供给为突破,在现有的发展基础上增设边境经济合作区(国务院现已在新疆、云南、广西、内蒙古等地批准设立 16 处)、互市贸易区、综合保税区(如凭祥、阿拉山口、喀什等)等多种形式的开发开放平台,进一步借助 G3012、G3014、G312、G219、G318、G214、G30、G80 等高速、国道及连接的相关铁路、省际高速等交通线路打通西部与东部、中部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对外联系通道,通过内外兼修的方式为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沿边省份的区域带动和均衡发展提供更多可能。

四、总结

基于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现有状况、存在问题和现有的经济宏观布局、区域发展格局、通道建设规划等,中国西部城镇化的空间格局优化要充分考虑我国国土资源开发“四纵四横”的轴带体系和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沿边开发规划及全国重点经济区建设、西部地区省会城市牵引的宏观布局,按照“重点布局、极核发展、轴带辐射、均衡推进、边缘带动”的空间发展思路,构建以陇海—兰新轴线西线、长江经济带上游轴线、珠江—西江经济带西线、沪昆轴线西线、青西轴线延伸段、包南延伸轴线、成昆延伸轴线和西部沿边发展带构成的网状结构为骨架,以国家、区域两级增长极和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边境地区、工业转型区、资源富集区 6 种类型区为填充,以成渝城市群、关中—天水城市群、兰州—西宁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 4 个发展型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黔中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新疆天山北坡城市群和藏中南地区 6 个形成型城市群共同构成的国家级、区域级两级增长极为突破,融合点线面要素形态、极核轴带类型区的复合型网络空间结构体系。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进城镇化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14EDA02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地缘环境视角下边境城市的区域发展潜力研究”(2015M570198)研究成果。

注 释:

- ①业界一般认为城镇化率在 30%~70% 时,城镇化是一个快速推进的时期,其中在 30%~50% 时是一个加速推进的时期,50% 是一个转折点,50%~70% 是一个减速推进的时期。
- ②泸州市、铜川市、白银市、石嘴山市 4 个地级市,阿尔山市、合山市、华蓥市、个旧市、玉门市 5 个县级市,易门县、潼关县 2 县和平桂管理区、南川区、万盛经济开发区、万山区、东川区、红古区 5 区。

参考文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 [2]霍文琦.未来城镇化的主战场在中西部地区——访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5-23(A01).
- [3]白永秀,严汉平.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滞后的现状及建设思路[J].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2(7):2-5.
- [4]任远.城镇化发展需要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撑[N].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4-08-26(B15).
- [5]裘品姬.新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调研及对策建议[J].新疆社科论坛,2011(3):24-29.
- [6]张明霞.西部地区城市空间结构与城镇化战略模式选择[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0(8):41-43.
- [7]魏后凯.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 [8]刘士林.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2014)[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9]王业强,武占云.国家增长极体系与城镇化格局构想[J].开放导报,2013(6):46-51.
- [10]魏后凯.中国区域政策:评价与展望[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
- [11]舒燕飞.我国少数民族八省区主要经济指标分析[J].中国统计,2010(6):53-57.

[作者简介]胡浩(1984—),男,河南周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经济、地缘环境与区域发展;魏后凯(1963—),男,湖南衡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产业经济、资源环境经济;晏世琦(1982—),男,甘肃定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博士,主要从事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的相关研究。

[收稿日期]2015-07-28

责编:黄晓梅;校对:芙蓉



2014年11月起到嘉峪关市挂职1年，任市委常委、副书记，深入河西走廊开展调研，此为考察阳关烽燧留影。

魏后凯

魏后凯，1963年12月出生，湖南省衡南县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所长助理，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候任理事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国际区域研究协会中国分会副理事长，民政部、国家民委、北京市、山西省等决策咨询委员，10多所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产业经济、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近年来负责主持70多项国家重大（重点）、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重点）以及各部委和地方委托研究项目，公开出版独合著学术专著14部，主编学术著作20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400多篇，主持或参与完成的科研成果获20多项国家和省部级奖项。2001年享受国务院颁布的政府特殊津贴，所领导的《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与政策研究》课题组2010年获“国家西部大开发突出贡献集体荣誉称号”。向国务院提交了近30个政策建议，多次获得国家领导批示。